

高瑞泉 主编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高瑞泉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字数: 420 千字

1996年7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本

ISBN7-5617-1507-2/C·048

定价: 27.1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高瑞泉)

- 一、近代中国何以思潮丛生 2
- 二、总貌概述 12
- 三、思潮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 19

第 二 章 人 的 尊 严

——人道主义思潮概述

(北京大学哲学系 陈少峰)

- 一、思想启蒙与人道主义 35
- 二、人道主义思潮的主线 39
- 三、思想方法 47
- 四、以自由观为核心的考察 53
- 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 57
- 六、比较的考察 59

七、几点结论	63
--------------	----

第 三 章

世纪末的新世界观

——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陈卫平)

一、第一大潮：进化论与中国近代 政治思潮	74
二、器道升替：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历程 ..	95

第 四 章

融入与逸出

——实证主义思潮评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杨国荣 郁振华)

一、历史演变和主要人物	133
二、理论特点及其历史意蕴	144
三、科学主义的正负效应	153

第 五 章

从龚自珍到“战国策”派

——略论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高瑞泉)

一、缘起与渊源	168
---------------	-----

二、演进中的两大主题·····	184
三、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214

第 六 章

理性与乌托邦

——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胡伟希)

一、冲击与反响·····	224
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崇拜”·····	229
三、社会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235
四、理性的误区·····	244

第 七 章

躁动的现代化之梦

——文化激进主义思潮述评

(浙江大学政治系 高力克)

一、文化激进心态产生的历史缘由·····	251
二、清末变革思潮与文化激进主义 的滥觞·····	255
三、五四时代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	264
四、五四以后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流变·····	281
五、结语·····	289

第 八 章

在历史与理念之间

——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中山大学哲学系 陈少明)

- 一、瓶与酒的说法……………297
- 二、辨种姓与悼礼俗……………302
- 三、理念的防线……………309
- 四、摆脱汉宋轮回……………314
- 五、余论……………318

第 九 章

向着“无何有之乡”

——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 齐卫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 钟家栋)

- 一、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322
- 二、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特征……………327
- 三、《新世纪》和《天义报》……………331
- 四、民初的传播……………337
- 五、五四时期的热潮……………343
- 六、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主张……………349
- 七、无政府主义何以影响中国……………354
- 八、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359
- 九、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衰落……………365

第 十 章

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

——民族主义思潮论纲

(徐州师范学院 姜新 李存煜)

- 一、动因与宗旨……………375
- 二、守旧与革新……………381
- 三、排满与反帝殊途同归……………390
- 四、经济利益与文化心态……………400

第 十 一 章

中兴与嬗变

——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

(无锡轻工业学院社科部 邓子美)

- 一、清末佛教复兴的社会文化背景鸟瞰…414
- 二、近代佛学理路之剖析……………420
- 三、佛教的改革及其社会影响……………429
- 四、中西宗教改革成败的启示……………436

第 十 二 章

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

——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天纲)

- 一、“伟大世纪”的基督教……………448

二、“广西国之学于中国”.....	463
三、“东渐”与“涵化”.....	478
四、传教士与近代思潮的演化.....	497
五、结语.....	513
 编后记.....	 516

第一章

导 论

本世纪初，一度执思想界牛耳、后终于退入书斋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劈头就说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其此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①中国近代，正是一“文化昂进之时代”，短短百余年间，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一扫龚自珍时代那种万马齐喑般的沉寂，林林总总的社会思潮奔涌而出，交错迭代、争持消涨，构成了空前绝后的独特文化景观。

以今人观之，半个世纪以前思潮纷呈的局面似乎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但是思想史决非百家往而不返的战场，我们的先人在精神世界的探险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容低估的遗产。不仅当代的诸多文化争论、思想分歧、政治方略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重复着先前的声响，而且今日社会的诸多公共习尚和观念共识，究根穷源，都与晚近百余年的思潮运动有不解之缘。所有这些，都使人们产生一种学术兴趣，去认真地清理反省那批思想文化史上的“公案”。

一、近代中国何以思潮丛生

人们通常将近代与春秋时期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恰逢社会巨变、观念转折，并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考察近代社会思潮的结果使人相信，在思潮的纷繁复杂、变化迅速以及覆盖广泛等方面，春秋战国实在难与近代相提并论。近代社会思潮的这些特征有其自身的原因或根据。

从最显性的生活世界看，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中国向何处去？之所以称这一问题是全然陌生的，是因为不仅汉唐盛世的诗人或哲学家不必以此自扰，康雍乾诸朝的君臣子民也依然沉酣于太平之中。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乱，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于是才有了这样一个全新的问题。面对这个指向未知世界的问题，答案自然会多种多样，加之中国幅员广袤、历史悠久，情势逼迫中国人必须在短时期内形成足以调动全社会资源的政治-文化设计，其最初的反应必定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简言之，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大小，都从属于历史性的巨变，作为社会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

从深层的心理世界看，浸淫日深的权威丧失是近代涌现众多社会思潮的主要精神背景。

汉代以降，中国人尊崇的权威是与王权统一的儒学价值系统。

清代沿袭宋明，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维持着原先的价值体系。但是情况在悄悄地变化：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代理学几无创造性可言，吸引知识精英的是考据学。它代表了清代前期至盛期的学术主流，按梁启超的说法，就是“清代思潮”。但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① 摆脱宋明理学羁勒的结果，不仅从古文经学中培育出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而且在近代的入口处，古文经学一变而由今文经学主领风骚，更是异端辈出。开拓者龚自珍以“心力”对抗“天命”，对传统的天命论价值系统提出了挑战；至戊戌年间今文经学经康有为之手演变为冲击权威、解放思想的工具。“儒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儒家基本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和信仰，却是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康氏已经使人对这些主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趋衰微。当康有为在改变长期被公认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学说的价值的内核方面走得如此之远时，其含义就更加严重了。任何读过康有为的富于煽动性解释的人必然会产生一个感到烦恼的问题：儒家的本来面目和特征何在？这个问题的出现预示着这样一种后果：使儒家学说从一直是无可怀疑的信仰中心，变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争议的一种思想体系。”^② 这后果像火山喷发或地震一般冲击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精英对传统价值的怀疑相应的，是传统的价值结构在日渐解体，价值原则与其物质承当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根本的背离。传统的价值结构是“权威”与“权力”合一，以皇帝为首的行政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页。

② [美]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

权力系统以及士绅代表着价值原则。但是在清代，它先是表现为从官场到士人日深一日的弥漫性道德沦丧，最后是辛亥之役令千年帝制随着满清的倾覆而告终结。这是一个加速度行进的过程，到20世纪初，从上层贵族（如《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开始的溃瘍已经漫延到整个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固有的物质承当。至此，旧价值不但丢失了作为理想或信仰的精神感召力，而且失去了世俗规范力量的支撑。天命论无可奈何地没落了。只有到了这一步，才可能产生以“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再造文明”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①

纵观中国近代，戊戌到五四，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价值观与信仰，从被怀疑到被批判，形成了两个相继跌落的低谷；同时，又出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奔涌的两大高峰，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都在这30年间发育流布。“丧乱之后多文章”，其间固然有实际运作的挫折引发的两次民族大反思这一原因，^②但正是原先定于一尊的权威之跌落，造成了解放思想的客观环境，与重建现代性民族价值的客观需求。因为几乎所有的近代社会思潮都或深或浅地涉及基本的价值问题，没有上述客观条件，就没有足以容纳异端的空间，自然难以产生百家并存的思想局面。

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与西方文化的冲击有极大的关系，后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之所以思潮勃发的外缘。随着列强入侵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撞击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与权威的直接摧破。承受“天命”的王朝抵御不了“蛮夷”的入侵，这些“蛮夷”尔后逐渐表明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如果不是更高类型的

① 关于传统价值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和中国近代价值丧失的演化过程，拙文《略论近代中国价值迷失之缘起》有更多的阐述与分析，见《学术月刊》，1994年11期。

② 按照陈旭麓先生的观点，甲午战役的失败引发了第一次民族反思，导向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了第二次民族反思，导向了新文化运动。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至少也是更为有效用的文化。在中西杂陈、新旧交错的近代中国，一元的独断论价值系统摧破的结果必定经历一个价值相对论的阶段，价值多元的状况可谓思潮丛生的最佳土壤。

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融入，对近代社会思潮的作用还远不止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思潮都受到了西方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地说，它包括：示范、刺激、传输与强化。

毫无疑问，近代中国某些社会思潮是外来文化移植的结果，最突出的例子即基督教的传播。此外，哲学上的进化论、实证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等，它们之所以在中国流布，中国社会内部固然有某种社会期待，它们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有某些接合点，但是最初都是西方同类思潮传输的产物。

站在另一端的，是一些主要应归属于中国本土文化产物的社会思潮，如佛教复兴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它们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特异的民族色彩，或者说根本上是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由固有传统演化而来。对它们，西方文化主要起了某种刺激与示范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一段盛极而衰的轨迹。前清不但高僧无多，而且与思想界几乎无关。但接近近代地平线时，最敏感的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俞理初辈纷纷转向佛学，预示着价值真空造成的负压将把昔日的异端吸入精神世界的中心。尔后大规模入侵的西方文化对佛教的中兴无疑是一种强刺激，也可以说是一种示范。为佛学复兴建立了大功勋的杨文会就说过：“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一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

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①表明中国人意识到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中足以与之抗衡的只有佛教。所以后来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曾主张以弘扬佛教来革新国民道德，从根本上自强、保国。

贯穿中国近代全过程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样是在西方刺激下产生的。列强的野蛮侵略行径激活了以“夷夏之辨”与“忠君报国”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潮头涌起在世纪之交。按照本杰明·史华兹的说法：“只要赞成把社会实体作为民族来保卫，并极力把这个目的摆在其他价值观念和信仰之前加以考虑……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就登上舞台了。”^②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民族危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同时也使最前卫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即必须以坚决的社会改革（维新或革命）为手段，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才能真正摆脱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

另一方面，列强的成功也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作出了示范，^③其中以日本为甚。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回国以后都大大地增强了民族意识，因为他们滞留日本期间大多饱受日本人的民族歧视、轻蔑和侮辱，同时也目睹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有力示范：“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与英国的结盟与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

① 杨文会：《支那佛教振兴策二》，《中国佛教思想选辑》，3卷4册。

②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风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③ 德、法、俄等国19世纪的民族主义潮流和弱小的被压迫民族如波兰、希腊、印度、匈牙利等国的民族主义，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很大的鼓舞，如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赞扬它们在文学上的代表：“刚健不挠，抱诚守真……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这使许多中国人意识到“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爱 and 爱国心。”^①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如人道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等，其最初之发端，大抵是在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从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的批判中生发出来的。所以最初的社会角色多为异端乃至叛逆，并且多以古代文化中固有的某些资源为依据，后来才渐渐地取得了西方近代类似的社会思潮所具有的观念形式与理论框架。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可谓个性解放与博爱大同两个主题的协奏。原始儒家的人文精神与对“大同”的描述成为近代社会理想的传统根据。近代发轫之际，龚自珍、俞理初这两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都主张个性解放。尤其是俞理初，他所主张的男女平权、反贞节说、反性别歧视等，都是借考据学的传统方法，从古代经史典籍中寻找根据而加以阐发的。^②到世纪之交，经过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洗礼，发展为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鲜明主题，并且在李大钊那里获得了统一。唯意志论思潮也是类似的。最初龚自珍、谭嗣同等人从反对天命论与理性专制主义出发，引用佛教的“心力”说与王门后学（泰州学派）的“造命”说，为主体的能动性辩护，为人的自然情感、自由意志辩护。后来才引进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唯意志论。“心力”说遂为“意志”论所代替。又如激进主义思潮，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颇能说明该思潮之缘起。甲午海战初期，孙中山正在北京，以窥清廷之虚实，结果发现，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京城之内，依然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知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

①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六章。

② 详请参见拙文《天下何人还识君》，《读书》，1994年4期。

救亡。“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①正是这种旧社会积重难返的现实和反动派对社会进步的顽固阻挠，推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激进主义的立场。并且相继寻找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不断掀起革命的洪波巨浪。

讨论至此，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近代社会思潮汹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它可以大略地概括为两个层面：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制度的更迭以及由此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与文化传媒。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和洋务运动带来的最初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缓慢地产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形态上看，它首先表现在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拉开。西方人将其据点从沿海扩展到长江沿岸，并在其中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②这种新的“河海文化”不但体现在一种新的社会阶层——买办——的出现上，而且通过一群新式知识分子来表达其要求与理想。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及其朋友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深受儒家经典训练，却又是因为西方人出现在上海而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的。“作为个人而言，他们颇不寻常，甚或有些古怪，有时才华横溢。就整体而言，他们代表了中国大地上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52页。

②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直到这时，他们才渐次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① 柯文描述的这群“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一个非常不恰切的名词——最初的职责大多是帮助西方人处理文字工作，主要是将西方文献翻译成优雅得体的中文，也将中国经典译成西文，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新闻出版业，成为报人、作家。由此，那些未能以传统方式追求权力与社会影响的部分士人，找到了仕途以外实现自我的新方式。

报刊在此有双重意义，它既是近代部分非正统的知识分子的新的生存方式，又是非官方的新的传播媒介。^② 这种传媒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之功，怎样评价都不为之过。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最早的非官方报纸，是由西方传教士主办的。本书中李天纲先生的论文可以告诉我们《万国公报》这类报刊在传播西学中如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尔后报刊迅速地变成了锐意改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喉舌。梁启超先后于1895年和1896年创办《强学报》与《时务报》，宣传改良，一时执舆论界之牛耳。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又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依然被视作思想界的旗手。在此前后，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还有严复协办的《国闻报》、谭嗣同的《湘报》、狄楚青的《时报》、同盟会的《民报》、章太炎的《苏报》和《国民日报》。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思潮都依赖这些报刊传播。不仅从海外传播到国内，也从沿海传播到内陆地区。到1906年仅上海一地出版的报纸就达到

①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② 报刊与现代印刷术都是西方文化传播的产物，后来华人的民间报纸才渐次出现。整个中国近代，政府始终未能完全控制住新闻报刊业，即使是专制集权程度很高的国民党政府也未能做到。